

一条战时宣传标语的影像印记

——记刘宗卓 1948 年拍摄的一条标语

刘力群

光影
史话
GUANGYINGSHIHUA

在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解放军报社原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刘宗卓留下的摄影资料中，一位青年刷写大幅标语“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照片，揭开了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关于劳动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宣传的往事……



黑白泛黄的老照片

我的父亲刘宗卓 1938 年从家乡湖南湘潭奔赴延安，入抗大一分校，后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参与创办《前卫报》。从那时起，他一边办报，一边摆弄从日寇那里缴获的照相机，零零星星拍摄了一些并非专业的照片，其中有 120 胶卷，也有 135 胶卷，大多是在地窖里冲洗印制的。

刘宗卓 2013 年去世，享年 93 岁，他虽然一辈子从事党和军队的宣传工作，曾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但留下的新闻文稿并不多。这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领导工作、定向把关和审稿编辑有关。在他遗留下来的若干影像资料中，有一些大小不一的照片和底片，尺寸不大，黑白而泛黄，其中有一张一寸大小的老照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画面上，一位穿军装的男青年在墙上用富有特点的美术字在刷写一条大幅标语：“保护民族工商(业)”。

这条标语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拍摄的？有什么历史背景？刷写标语的那位青年是谁？照片的拍摄者又是谁？面对这张虽很老旧但画面仍很清晰的一寸小照片，我产生了诸多疑问，也充满了兴趣，因为我知道，从标语的文字内容上来看，这条标语是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重要方针和政策。

刘宗卓去世两年前，我们兄弟姐妹帮助他编印了两册书法作品选，名为《宗卓墨迹》，其中百余幅书法和兰竹习作都是他自己选定的，其中还有一些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的书信手稿。他晚年喜欢练习草书，尤爱临摹怀素《自叙帖》，他的草书习作如录写名人诗词，我根据文字内容大体能识别，但有些书信手稿识别起来就颇为费劲。

他去世 10 多年后，我在整理他的影像资料的同时，也常浏览并尝试识读他的草书手稿。突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宗卓墨迹》“书信手稿”一栏中看到“致刘晓刚”，这封信写于 1999 年 11 月 24 日，共 10 页，全部收录于《宗卓墨迹》上册。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晓刚同志，大概自大汶口为你拍照后，我们有半个世纪未再见面了……”

拍照？大汶口？诸多问号存于我的脑海中……



▲ 1948 年冬淮海战役期间，刘晓刚(右三)与牛玉华(左三)及鲁中南报社编辑室的同志们在临沂郊区曲沂村合影。

▼ 刘宗卓(右一)、牛玉华(中)与刘晓刚(右二)于 2004 年 8 月 21 日在北京合影。



在大汶口为晓刚同志拍照

对于刘晓刚，我早有所知，他是我母亲牛玉华的老战友，1945 至 1949 年间，与他们同在中共鲁中南区委机关报《鲁中南报》工作，任美术编辑。1949 年 3 月，牛玉华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妇代会，刘晓刚赠送给她一本日记本，封面上《旅平日记》几个美术字是他亲手绘制的；1949 年 7 月，牛玉华从山东临沂南下到刚经历渡江战役的丈夫在金华会合，刘晓刚又赠送给她一枚用黄杨木精心刻制的印章“牛玉华印”，作为送别礼物，这方小小的印章我至今保存并珍藏着。

刘晓刚于 2022 年去世，生前曾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临沂市设有“刘晓刚书画艺术馆”。

根据那封信，我顺藤摸瓜，在刘晓刚寄给父母亲的书信和资料中，发现了一期《洗砚池》杂志(山东临沂综合文化期刊，2006 年第 2 期)，刊登有牛玉华的一篇文章，题为《战火、友情、艺术：谈刘晓刚画集有感》，翻开一看，其中竟然有关于刘宗卓给刘晓刚拍照的内容和段落，这下终于解开了我关于那幅老标语的疑问。

文章是这样写的：“1948 年夏，津浦路的大汶口战役，刘晓刚冒着敌机扫射在街上写大标语，正巧遇上了我爱人刘宗卓，他当时在鲁中南区委宣传部工作，看到晓刚在一条长墙上写‘保护民族工商(业)’大标语，顺手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武装整齐的刘晓刚，看起来的确是长高了。这张照片经过 50 多年之后，又重新于他赠我的《难忘的岁月版画集》的封底上，这幅照片上面，还有一幅我们《鲁中南报》社编辑室新

聚集起的 8 位同志的合影。这都是距今几十年经过战火洗礼、风雨沧桑的珍贵史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条标语刷写的历史背景，我上网查了“大汶口战役”，并查阅了 1949 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政策汇编》(上、下册)。大汶口现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战役”，又称“大汶口歼灭战”“大汶口阻击战”。解放战争中，1948 年 7 月 15 日，山东兵团九纵在山东大汶口歼灭增援兖州的国民党整编第 84 师 161 旅全部，155 旅 464 团及整编 211 旅一部。那张照片就是在此战之后拍摄下来的。

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

在山东分局编印的《政策汇编》上册中，我查阅到 1948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这个文件中所指出的问题和相应政策，我想是与刘晓刚刷写“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那幅标语密切关联的，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

这个指示有 4000 余字，其中一段讲得非常具体：

在过去所收复的城市中，除少数城市外，都曾发生过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行动，东北局、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虽曾经屡次对攻城部队和地方党委指示，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改进，但一直到攻占四平、鞍山、收复吉林时，违反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仍然继续发生。产生违反城市及侵犯工商业政策的有下列几种情形：

- 第一、是某些攻城部队纪律不严，对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教育不够，本位主义地乱抓物资，违反纪律，不讲政策。
- 第二、是某些部队的后勤人员，如供给、卫生、通讯、辎重等机关人员，借口“军用”，借口没收蒋介石“敌产”，因而侵犯工商业，搬运器材，拆卸零件，拿走皮带，损害工厂设备等。
- 第三、是某些后方机关各单位的生产人员，只顾本单位的利益，到新收复的城市抢购物资，做买卖，扰乱收复城市的金融物价。
- 第四、一部分城市贫民，由于国民党造成的饥饿与极端贫穷，在战争中及战争结束后，乘机“发洋财”，而部队人员时常从片面的所谓“群众观点”出发，不仅未加说服与禁止，反而采取放任态度，而潜伏的特务分子和流氓，则更加乘机破坏、捣乱。
- 第五、四郊农民自动进城逃亡地主清算，因而破坏一部分同地主有联系的工商业。

……

每个革命军人、地方党政人员、解放区人民，都应把城市看作是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力量，应该严格遵守党和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城市政策和法令，反对乱抓物质的本位主义，反对片面的所谓群众观点，防止破坏城市、破坏工商业。

从旧资料中发现一张含有那么多信息的老照片，是我始料未及的。照片中的主人翁刘晓刚、拍摄者刘宗卓、拍摄地点、山东泰安大汶口、拍摄时间 1948 年 8 月、照片中“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历史特有内容，还有见证人牛玉华写的说明(如现场有敌机扫射)，构成了一幅非常完整的影像印记，成为历史的见证，也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熟视无睹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李氏宜荫楼等珍贵藏书也化私为公。

20 世纪 50 年代，郑振铎主持成立了文物征集小组和北海团城文物收购点，促成大量海外珍贵文物的回归，陆续将许多文物精品收归国有。举世闻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的王羲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便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以 35 万港元重金从香港购回的。他还促成了对陈清华藏宋版古籍的收购及苏联《永乐大典》11 册的回归，还使有价值珍贵的宋版《文选》《金石录》、明刻本《列国志传》等古书免于遭受纸商“入锅化浆”的“废纸”之劫。

郑振铎常说：“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他不幸因公殉职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他的藏书，出价高达 40 万元，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但其夫人高君箴女士遵照郑振铎的遗愿，把他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国家。“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坚苦到底自不致有人疵议”。郑振铎用真情和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担当，他收藏报国、保护文物的一生，正是对“值得贡献的事业”的最美注解。

罗家伦首提“五四运动”

周惠斌

文人
轶事
WENREN YISHI

1919 年 5 月 3 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北洋政府将同意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德国在山东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条款，他将消息告诉了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当晚，北京 13 所学校学生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外文系学生罗家伦被推举为学生总代表之一。

5 月 4 日上午 10 点，罗家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对他说道：“(示威游行)不能没有宣言，许德珩起草了文言文。但北京 8 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草白话文，你来执笔罢！”罗家伦没有推辞，略加思考，写下了一篇 200 多字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来，罗家伦在《黑云暴雨的明霞》中回忆了起草宣言时的情景：“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宣言中写道：“现在日本在万国

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气势磅礴，明确提出了示威游行的目标“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令人热血沸腾，极具号召力。

下午 1 点，约 3000 名学生代表带着 2 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走上街头，来到天安门演讲、宣读。随后，他们又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和东单牌楼附近，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5 月 26 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每周评论》第 23 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总结出有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罗家伦因此成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以及“五四运动精神”最早的概括者。

赵忠尧与叶企孙的善良

张雨

文人
轶事
WENREN YISHI

赵忠尧是物理学家，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叶企孙是物理学家、教育家，钱学森、钱三强、李政道、杨振宁等都是他的学生。

赵忠尧和叶企孙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值昆明物价飞涨的时期，那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的工资特别低，连乞丐都不向教授要钱，因为乞丐也知道教授们真的很穷。为了贴补家用，赵忠尧与叶企孙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个制作肥皂的小作坊。

赵忠尧和叶企孙生产出的肥皂，有去污力强，泡沫丰富等特点。用过他们生产的肥皂的人，都赞不绝口。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再加上肥皂经济实惠，物美价廉，很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明星”产品。他俩每个周末都要推着自行车到大街小巷去卖，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一段时间后，两人在一起算账，两人卖出的肥皂总量相差无几，但赵忠尧赚的钱却只有叶企孙的一半。叶

企孙感到有些纳闷，就问赵忠尧：“咱们不是卖同样的价格，你为啥比我少卖一半钱呢？”

赵忠尧支支吾吾、有些难为情地说：“我自作主张，卖给几家小百货店了。那几家小百货店的生意不景气，店主都是穷苦人，日子过得比咱们还难，我不忍心赚他们的钱，所以只收了个成本价。”此时的赵忠尧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似的，接着嗫嚅道：“要不这样，你赚的钱归你，我一分也不要，你看行吗？”叶企孙听后，微微一笑，说：“老赵啊，你善心做好事，我能把赚来的钱归为己有吗？你早说不就成了。干脆，我成全你，咱们把剩下的肥皂全部按成本价推销给他们，就算我也做了一回善事。”说罢，两人四目相对片刻，而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身处困境，赵忠尧和叶企孙仍能想到和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人，并努力去帮助他们，从心底流淌着暖心的涓涓善意。在令人感动之余，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

夏丏尊当“舍监”

王剑

文人
轶事
WENREN YISHI

1912 年，夏丏尊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为了实践他的“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主张，他自告奋勇地申请兼任“舍监”一职。

所谓“舍监”，就是训导主任，不仅待遇低，又为学生所轻视。但夏丏尊不嫌官小，当“舍监”当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

夏丏尊管理学生，倾注了诚挚的爱心。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之池，任你形状如何，总逃不了一个空虚。”他从教务处要来了学生的花名册，很快就记住了学生的姓名、籍贯和相貌。每天清晨起床铃一响，他就去学生宿舍巡视，如果发现学生有学生不及时起床，他就一个个地叫起来。晚自习时若有人喧闹，他就耐心地劝告制止。放假了，学生走出校门，他要在后面喊一句：“早些回来，别吃酒啊！”学生走远了，他还要踮着脚尖在后面再补上一句：“铜锣要用些！”看见学生欺侮小狗，他也要絮絮叨叨：“为啥要同狗难堪啊？”

有一次，宿舍里有一个学生的财物失窃了。夏丏尊自愧失职，他与同事李叔同商量后，就在宿舍楼外贴了一个通告：“学生财物失窃，我身为舍监，深感惭愧。自即日起，不找回失物，誓不进食。”通告一出，立即惊动了全校，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了夏丏尊。此后每到饭点，夏丏尊就真的站在人多的地方，停止进食。最终，那个偷窃的学生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自动找到夏丏尊承认错误，并交出了所偷的财物。

夏丏尊的言传身教，赢得了学生们的敬重。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堂当了七八年舍监，学校秩序井然。后来，夏丏尊以这段管理经历为素材，写出了《文心》等系列教育小故事。

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当年曾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夏丏尊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

吴青霞助建艺术院

周星

文人
轶事
WENREN YISHI

吴青霞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她晚年曾多次向家人表达自己想建一座艺术院的愿望，希望她手中的作品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其实，以吴青霞的名气和藏品，在上海建一座艺术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她的心却一直留在家乡常州，时刻惦念家乡的发展。

1998 年，常州市政府决定建设“吴青霞艺术院”，以表彰这位常州优秀女儿的非凡艺术成就。吴青霞闻讯后，当即表示要把自己的绘画精品及其丈夫吴蕴瑞先生共同珍藏的 100 多件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无偿捐赠给家乡。当她获悉“吴青霞艺术院”建设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

时，又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作为艺术院的启动基金。她雇用麻袋装了 100 万现金送去，这是她毕生的积蓄。为此，常州市文化系统各单位都派会计来清点，其中不乏还有五元十元的纸币，会计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清点完毕。

2000 年 6 月，一所典雅、壮观、园林式的“吴青霞艺术院”正式竣工，时年 90 高龄的吴青霞又一次回到常州。这次她是专门来参加“吴青霞艺术院”落成典礼而来。家乡人民早早赶到广场恭候她的到来，面对这些热烈的掌声，吴青霞只是深情而朴素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们！”

一生珍藏故园情，龙城女史桑梓情。这就是吴青霞，一位老艺术家的浓浓家乡情！

收藏家郑振铎的爱国情怀

王厚明

郑振铎的藏书“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郑振铎收藏典籍可谓用心良苦，并为之付出大量心血。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收藏书籍的热爱和艰辛：“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郑振铎收藏旧籍的初衷，源于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并没有升值牟利的念头。正因为如此，一生博学的郑振铎藏书也十分广泛，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

1937 年起，日本侵略军陆续占领了上海和东南各省。不少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大量散失海外，郑振铎对

此忧心忡忡，决心组织一场抢救行动。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以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拨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珍贵古籍。为了收购著名的元杂剧本“六十四册”，面对上千元的高价，他千方百计筹好款去时，却被告知已被人抢先定购，价格抬高到上万元。郑振铎等不及教育部拨款，找到暨南大学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开明书店的陈乃乾从中“作伐”，最终以 9000 元将书购下。

郑振铎不仅收集古籍，还注意搜集陶俑，靠的是并不宽裕的大学薪水和稿费，经常是东拼西凑、节衣缩食、说尽好话。仅购买明刊本《古女今范》一书，郑振铎就花掉了全家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而为了买一个要价十几两黄金的唐三彩骆驼，他议

好了价却拿不出钱来，只好央求卖家等着自己去凑钱。一次他在一家苏州文物店偶然发现一件汉代陶俑，当即倾其所有买了下来。当他欣喜若狂地捧着陶俑走在街上，才发现自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留下。

郑振铎的收藏伴随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他眼里，祖国文物“不仅是中国先民们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1953 年，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不久，郑振铎就将自己重金收购的陶俑等文物 502 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57 年又将所藏雕塑等文物捐赠给国家，连一张证书也不要。此外，郑振铎还动员张大千将其花 500 两黄金收来的五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低价转让给了国家。在他的努力下，常